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المسالك والممالك

لإبي القاسم عبيد الله بن عبد الله المعروف بابن خرداداذنب
الموفى في حدود سنة ٥٢٠ هـ

ويليه

مسيرتك في بلاد الهند وصنعها للكبيرة

إذ أخرجها من بلاد الهند في حدود سنة ٥٢٠ هـ

志 国 邦 里 道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著 宋 峴 译注

K. 33
1

80818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道里邦国志

附：税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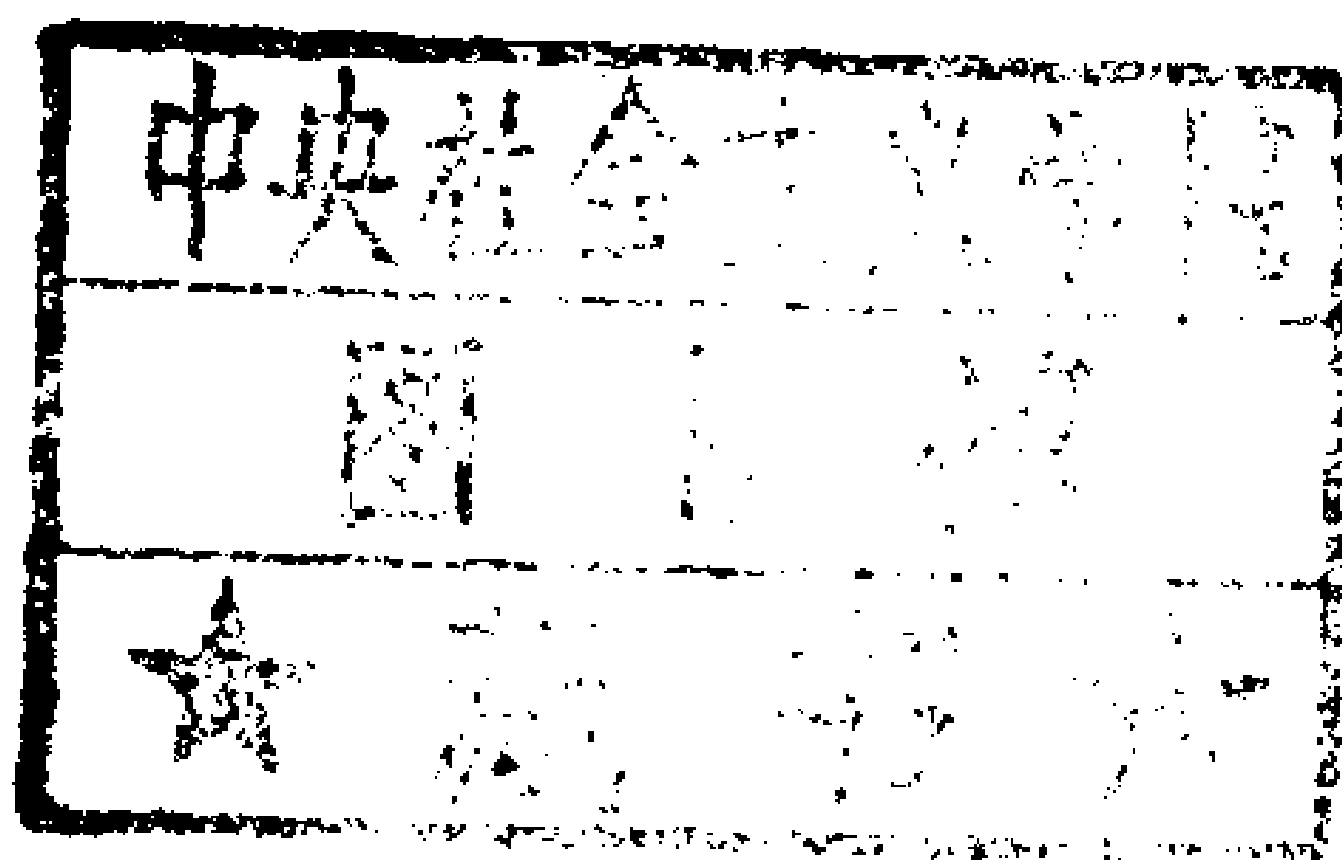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著

宋 岷 译注

邳 溥 浩 校订



200258522



中华书局

KITÂB AL-MASÂLIK WA'L-MAMÂLIK

Auctore

Ibn Khordâdhbeh

Et Excerhta E

Kitâb **AT**Kharâdj

LUGDUNI-BATAVORUM

APUD E. J. BRILL.

1889.

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道里邦国志

附：税册

[阿拉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著

宋 颉 译注

鄧溥浩 校订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1/32·10¹/₄印张·184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定价：6.40元

ISBN 7-101-00483-0/K·213

前 言

摆在读者面前的，是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两部代表作。两书现经宋岷同志直接从阿拉伯文原著译出，并由中华书局出版。我国新开拓的学术领域——阿拉伯学因而增添了极为重要的典籍，可喜可贺。

两部著作一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道里邦国志》，一是古达玛的《税册》。两书的命名与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有关；研究穆斯林地理学的学者们又往往把两书列为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伊拉克派著作。为了说明两书的命名来历，特别是为了说明两书在阿拉伯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让我首先简单介绍一下九到十一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的情况。

一、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和两书的命名

阿拉伯地理学是在八世纪中叶开始产生，八、九世纪之交受到希腊、伊朗、印度的影响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此之前，阿拉伯人只是从王朝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把学术分为“旧学”和“新学”。“旧学”包括语言学、教义学、法学、史学，他们认为这些学科肇始于伍麦叶王朝时期（661—750年）；“新学”包括天文学、数学、医学和哲学，他们认为这些属于精确学科，其发展始自阿拔斯王朝（751—1258年）。地理学在阿拉伯人

的学科分类中被视为精确学科，因为它接近于天文学。就地理学本身而言，真正的地理知识是在阿拔斯王朝建立(751年)之后积累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艾卜·加法尔·曼苏尔哈里发在位时期(753—775年)、特别是在他奠都巴格达(762年)之后得到发展的。阿拉伯人征服伊朗、埃及、印度，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和获得古代文明古国的科学文化知识。曼苏尔在治国过程中极其关心把外来的科学著作译为阿拉伯文。他大力提倡的翻译事业被后人继续了二百年之久。许多翻译家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这些译者兼学者把希腊、埃及、伊朗、印度的地理学、天文学、哲学知识引进了阿拉伯世界，从而大大丰富了阿拉伯自身发展起来的文化的內容。

在各种外来的文化中，对阿拉伯地理学影响最大的可能要数希腊人克劳丢斯·托勒密(约90—168年)和其他天文-地理学家、哲学家的著作。希腊人的著作是通过中世叙利亚文(Syriac)的中介译本而对阿拉伯人产生影响的。许多学者认为，“地理学”(juḡhrāfiyā 或 jiḡhrāfiyā 或 jaḡhrāfiyā)这个名词本来就是提尔城(Tyre, 黎巴嫩南部地中海岸城市，古代的推罗城)的马里诺斯(Marinos, 约70—130年)和托勒密的著作的标题，阿拉伯人把它译作“大地的形象”(ṣūrat al-ard)，有些阿拉伯地理学家便以此作为自己著作的标题。马斯欧迪(Mas'ūdi, ?—956年)把这个名词解释为“大地的区划”(qaṭ' al-ard)，并在《雅致的信札》((Rasā'il Ikhwān al-Ṣafā'))中第一次从“世界与各地图绘”的意义上使用了juḡhrāfiyā这个名词。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也说过，他参考过托勒密的著作，只是人们现在不清楚他使用的是希腊文本还是中世叙利

亚文本。希腊地理学对阿拉伯学者影响之广泛，由此可见一斑。

伊朗传统对阿拉伯古代地理学和地图学的影响也很明显。研究穆斯林地理学的著名学者克拉默斯 (J.H. Kramers) 指出，在九世纪，希腊地理学的影响占绝对优势，但从九世纪末起，伊朗的影响日益增强。例如，到十世纪，尽管科学知识已经有了长足进展，但来自伊朗的某些传说仍在阿拉伯地理观念和制图学中占据着显著位置。具体说来，大地的形状被比作一只巨鸟，中国是它的头，印度是它的右翅，曷萨是它的左翅，麦加、汉志、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是它的胸腹，北非是它的尾巴(见伊本·法齐赫书，德·胡耶刊《阿拉伯舆地丛刊》第5卷，页3-4)。这种传说甚至构成了九到十一世纪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中的巴里黑学派(详见下文)的基础。有些学者认为，这种观念有可能渊源于阿拉伯人看到的某种古代伊朗地图(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阿赫默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卷2，莱顿，1965年，页575)。

印度的天文学比地理学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阿拉伯学者从印度人那里学到了天转实际是由于地转(天转地不动只是由于地球依地轴自转而使人产生天转地不动的表面印象)，大地水陆各占一半，大地有如龟背、四周被水包绕，大地犹如穹窿、斯里兰卡为其顶端，大地的标准子午线始自 Ujjayn 等观念。

与上述受到希腊、伊朗、印度影响的自然地理学发展的同时，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还有另一条发展的脉络，这就是阿拉伯自己的描述地理学的发展，其来源可以追溯到比自然地理学

形成更早的阿拉伯旅行者的行纪。描述地理学在它产生的初期,曾同教律学、语言学等有联系,其后又与美文学的发展有关,此外,描述地理学又和自然地理学相互影响,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混合型的作品。但是,不管怎样,对于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来说,由行纪发展起来的描述地理学这条脉络似乎更有典型意义,更富特色。正是这条发展线索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特殊的风格,人们很难在其他语言文献中找到如此大量的同类撰述。阿拉伯的描述地理学作品以它们的内容之丰富、材料之驳杂而令人赞叹不已,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从这些内容和材料中寻找各自所需要的资料。

此外,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还有特殊的宗教原因:

1. 伊斯兰教重视每日五次礼拜、每年赖麦丹月斋戒,这对于促进天文-地理学的发展是有作用的。每昼夜五次礼拜的时间,斋期的开始与结束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这就要求有一定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才可以判断时辰。礼拜依据的平太阳时,取决于礼拜者对所在地点的经度有精确的认识。例如,日晷的影长每天都需要进行计算,当日晷刻度上的下午影子比中午长的时候,所谓“晡礼”的时间便到了。这时候,礼拜者的跪拜要朝向麦加的克而白(ka'bah),这个方向叫“朝向”(qiblah);一切礼拜寺的殿堂的方位和布置也要考虑“朝向”,以便使所有礼拜者叩拜时朝着麦加的方向,这样一来,遍布世界各地的清真寺虽然各依其所在地点而取向不同,但都以麦加的克而白为“朝向”中心,从而在地球上的布局好像构成了一圈一圈的同心圆。这一定向工作要求人们了解每个特定地点相对于麦加的位置。

2. 伊斯兰教的“五功”之一是朝觐，这就是有一定收入的穆斯林一生中至少必须到麦加朝圣一次。阿拔斯王朝时期无论是内陆驼队贸易还是海上交通都非常发达，这不仅沟通了王朝治下的腹里与边远地区的往来，而且使王朝的影响远及于疆界之外，到达中非、东北欧、印度、中亚、东南亚和中国，从而也扩大了朝觐所涉及的世界。

3. 某些宗教信念也有助于地理活动的开展。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有一则圣训 (ḥadīth) 称：“学问，即便远在中国，亦当求得之”。这条圣训也许出于后世，但它曾经促使某些信徒东来中国寻求学问。阿拔斯朝哈里发瓦西格(842-847年)为了探究《古兰经》中有关东方的几则传闻，先后派遣通事撒拉姆(Sallām)、著名学者穆罕默德·花刺子米(Muḥammad Khwārismi, ?-850)陆续东来。有些阿拉伯作家、地理学家的著作引证了他们留下的报导，这些富有浪漫色彩、夹杂了过多的荒诞故事的记述，和海上辛巴德的神奇事情一样，往往令人难以全然置信。但是，它们有助于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十二世纪，甚至远在安达陆斯(西班牙)的一位教法学家萨阿德·海尔·安萨利·安达陆西(Saʿd Khayr Anṣārī al-Andalus, ?-1146年)，得到“中国”的附名，原因据说就是因为他曾到中国游历。

由此可见，即便抛开个人志趣和学术旨趣不谈，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也必然促成内容驳杂的地理学文献的产生。如上所述，阿拔斯时期的阿拉伯人只是把地理学当作是最接近天文学的一门精密学问，并没有把它看作现代意义上的定义明确、范围确定、有专门内涵和特定对象的学科。因此，阿拉伯人在地理学的名称上也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字样，来自希腊语的

地理学——*jughrāfiyā*——一词有时指自然地理学，有时被当作“经纬度学”或“诸城定点学”（这是比鲁尼的说法，参看《伊斯兰百科全书》新版，阿赫默德写的“地理学”条，该书卷2，页575）。一般描述地理学通常被称为“道里邦国志”，这就是我们这里介绍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地理著作所使用的书名。

不过，阿拉伯古典地理学文献毕竟有某些共性。因此，各种主题和内容的地理学著作最后大多数以《诸国志》(*Kitāb al-Buldān*)、《大地之形象》(*Ṣūrat al-Ard*)、《道里邦国志》(*Kitāb al-Masālik wa'l-Mamālik*)、《道路记闻》(*ʿIlm al-Ṭuruq*)等命名，名称虽异，实际不出描述地理学的范围。

促成阿拉伯地理学发展的诸多因素有如上述，强调这些因素决不等于轻视地理学与政治的关系。阿拔斯王朝在施政过程中，在八、九世纪设置了一系列国家公务部门，特别是财政税收管理部门。为了控制和管理全国各地，为了敛取税收，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需要维持良好的交通路线网，需要搜集各种路线里程资料，了解驿站、转运条件和物资状况。在伊朗，阿拉伯人利用了萨珊王朝库思老·阿努什尔旺(531—579年)的籍帐；在埃及，利用了拜占庭官僚制度的复杂的行政程序。然而，变化了的条件要求反复核查有关省份和城镇、村落的位置、人口、农业手工业生产、课征税额等等的确切资料，于是，专门的《税册》(*Kitāb al-Kharāj*)便应运而生。它最初是官员胥吏使用的手册，可是后来也为更广泛的人们利用起来。

不仅如此，阿拔斯王朝是当时的世界大国，它的国际地位

使它不能只限于了解自身疆域内的情况，它也需要具备对其他地区、首先是毗邻地区的某些准确知识。因此，在《道里邦国志》、《税册》等地理著作中也采纳了阿拔斯王朝以外国度的有关地理情况。为了获得这些情报，和平时期的使节和战时的俘虏都是阿拉伯地理学家了解情况的对象。

二、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中的伊拉克派和巴里黑派

以《诸国志》、《道里邦国志》为著作标题的阿拉伯地理学家往往以修订、增补前辈的同类编纂物作为自己的著作。这一批编纂家递相变前贤的著述为自己的著述，有时连书名也沿用不变。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并不认为是剽窃攘夺。因此，九世纪以来的许多地理编纂物也被概括称为“道里志”派著作。

如上所述，九至十世纪是阿拉伯(穆斯林)地理文献发展史上最具特色的时期。在西部，十世纪虽然是哈里发帝国政治瓦解的时期，但文化极为繁荣；在东部，哈里发帝国在九、十世纪开始瓦解，导致几个地方王朝的出现，而地理学就其创造性而言，正是在萨曼王朝(874—999年)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因此，学术界把九至十世纪称为阿拉伯地理学的古典时期。并根据这一时期的地理学文献的特征区分之为两个派别：

一派作品论述的对象是整个世界，但仍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伊斯兰帝国”(Mamlakat al-Islām)。他们力求为一般伊斯兰教文献中看不到的世俗知识争取一席之地，因此也被称作“当代世俗地理文献”。这派学者主要描述地形和“伊斯兰帝

国”即阿拔斯王朝的道路系统,同时涉及数学、天文学、物理学、人文及经济地理学。代表人物有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伊本·法齐赫、古达玛和马斯欧迪。由于伊拉克是阿拔斯王朝立国的中心,许多地理学家云集于巴格达等地,故学界称此派为“伊拉克派”。不过,这个学派的学者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依四方(东、西、南、北)来编排材料并力求把巴格达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另一类则按各种不同的“地带”来编排材料,而且极力表彰麦加的中心地位。

另一派的叙述一般局限于伊斯兰世界,把每一个省区都描写成一个单独的“地带”,而且除边缘地带之外很少涉及非伊斯兰地区。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和穆卡达西属于这一派。因为他们都追随地理学大家阿布·宰德·巴里希之后,学界把他们又称作“巴里黑派”。

下面我们对两派地理学著述的特点做一点详细的介绍。

(1) 伊拉克派

本派代表人物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和马斯欧迪的著作有两大特点,这使他们有别于本派其他地理学家的撰著:第一,他们的叙述遵循伊朗人的“地区”(kishwar)体系;第二,他们以伊拉克与伊朗诸郡相提并论,但以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中心来开始区域地理学描述。据比鲁尼,伊朗人的七个“地区”是七个相等的圆圈,中心“地区”是伊朗,它包括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伊拉克。比鲁尼认为这种划分是武断的。应当看到,在巴格达被立为阿拔斯王朝的首都之后,伊拉克自然而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在政治上占据了首要地位。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将伊拉克同伊朗诸郡和塞瓦德地区

〔这里在古代被称作“伊朗沙赫尔的心脏”(dil-i Irānshahr)〕相提并论,而且占据了地理学体系的中心位置。

与上述几位地理家相反,古达玛、伊本·鲁斯塔和伊本·法齐赫则表现对伊拉克和伊朗沙赫尔并无热情。在他们的体系中,麦加和阿拉伯半岛被置于优先地位。在古达玛书中,麦加被赋予绝对优先的地位,通向麦加的所有道路都被放置在巴格达幅射出来那些道路之前。固然,他也重视伊拉克,不过只是把它看作阿拔斯帝国的一个主要省份,也就是说,只是出于政治和行政的考虑。由此可见,古达玛的地理学体系显示了一点细微的变化,这就是重心从伊朗观念转向了“对伊斯兰的探讨”。在伊本·鲁斯塔书(四/十世纪初)中也能看到类似的倾向,他彻底摆脱了伊朗传统,在编排地理学资料时把麦加和麦地那断然列在首位。伊本·鲁斯塔甚至在对七种“地带”的描述中也宁可依照希腊的形式而不遵循波斯的“地区”体系。伊本·法齐赫的地理学著作也是如此,有关麦加的描述居于优先地位,不过该书的相当多的篇幅是讲法尔斯、呼罗珊等地的,因此,他对“地带”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波斯的“地区”系统。

虽然如此,胡尔达兹比赫、雅古比也好,古达玛书也好,他们的共同点是编排和叙述材料所遵循的原则是依东、西、北、南把世界划分成四片地区,即所谓“四方原则。”这种描述方法应当在某些伊朗地理学传统中找到其根源,这些阿拉伯地理学家必定有某些可以模仿的先驱模式。据马斯欧迪说,波斯人和纳巴泰人(Nabatæan, 巴勒斯坦)把世界上的居住区分为四部分,即呼罗珊(东)、巴赫塔尔(Bakhtar, 北)、忽尔巴朗(Khu-

rbarān,西)和尼姆鲁兹(Nimruz,南)。然而,古达玛看出了这种划分的主观随意性,因此,对他来说,东、西、北、南这几个词只有相对的意义。

(2) 巴里黑派

这一派因阿布·宰德·阿赫马德·本·萨赫勒·巴里希(约235/849—50—322/934)而得名。巴里希生于巴里黑,主要活动在中亚地区。他年轻时在伊拉克住过八年左右,曾就学于铿迪(?—260/873—74年)门下。回故乡之前广泛游历各地,学习了多种学科,后以天文学家和哲学家知名。回乡后一直住在巴里黑,受到萨曼王朝宰相扎伊哈尼的礼遇。巴里希的后半生可能持有正统观点,他的一些论文得到正统派的很高评价。他的地理学著作名为《诸域图绘》(Ṣuwar al-aqālim),这是一部附有简志的地图汇编。然而,巴里希这部著作迄今仍然找不到单独成帙的确证,一度被归到巴里希名下的一份写本,现已证明实际出于伊斯塔赫里的手笔。看来,现在人们还只能维持德·胡耶的原来意见,即伊斯塔赫里的《诸国道里》囊括了巴里希原著的全部内容并进行了许多增补,编成于巴里希在世的318/930和321/933年间。总之,巴里希书已经失传,但世人靠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穆卡达西等人递相增修的多份传世抄本仍可得窥原作概貌。

巴里黑派赋予阿拉伯古典地理学以正派的伊斯兰色彩。这一派作者把自己的叙述范围限制在“伊斯兰诸国度”(Bilād al-Islām)之内,对于非伊斯兰国家只是在他们的著述中略加叙述。这一派作者以《古兰经》中的说法,或者以“圣训”为依据。例如,他们把大地比作一只巨鸟(参看上文),这与阿布都拉·

本·阿穆尔·阿斯的传说是一致的：他们又说，大地呈圆形，并被“环形之海”所包围，有如动物脖颈上的环纹，这个“环形之海”有两道“深渊”，即地中海和印度洋两者，中间因隔有障碍物(barzakh)而互不相通，隔离它们的障碍物就是古勒祖姆(al-Kulzum,即今苏伊士)，显而易见，这是来自《古兰经》的观念。

与伊拉克派的某些地理学家不同，巴里黑派的这几位地理学家都把世界的中心置于阿拉伯半岛，这就是克尔白所在的麦加。巴里黑派的兴起稍晚于伊拉克派，主要是在十世纪。他们的本意唯在描述“伊斯兰诸国度”(Bilād al-Islām)。

他们把这些国度分成二十个“地带”，他们的“省区”划分既不是根据伊朗的“地区”系统，也不是依照希腊的风土系统而是地域性的，纯自然的。对于先前的主观区划而言，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或许还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的尝试，例如，伊本·豪卡勒说过：他没有遵循“七个地带”的模式，也许这种模式曾经是恰当的，但现在则充满了混乱，有好些“省区”界线交迭重合了。因此，他为自己的每一章都画了一幅地图以描述每一个“省区”的形势，注记边界及其地理现状。由此说来，这一派地理学家的重要贡献就是他们有了自己的系统，从而扩展了地理学的范围，使其中包括新的、更实用、更有益的内容。本派诸家著述抄本大多有图有志，舆图共 21 幅，这种图志体的地理著作的图幅数、形状、次序趋于固定，因此人们通常称之为《伊斯兰方舆图》。舆图的总图是一幅圆形世界地图，上面表现了“伊斯兰诸国度”的各个不同地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非伊斯兰“国度”。该图力求运用一定的透视原理显示这些国度，表现每一个地区的相对位置和大小。但是，由于

全图并没有表现各个“地带”的真正比例和形状(圆的、方的或长方形的),因而他们实际上放大了每个“地带”的面积。他们这种画法在阿拉伯制图中可能是第一次尝试,但这套最后定型的舆图毕竟是这一派的又一贡献。正确地对待这些地图并对它们的内容进行仔细的考定勘同,肯定有助于解决巴里黑派地图的起源问题。

伊斯塔赫里、伊本·豪卡勒和穆卡达西还第一次把国家概念作为地理学术语提了出来,他们划定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王国的边界。

大部分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在上个世纪即经荷兰学者德·胡耶校勘付印,结集为《阿拉伯舆地丛刊》(Bibliotheca Geographorum Arabicorum,简称BGA)。书凡八卷,1879—1939年刊于莱顿。今天,人们使用《阿拉伯舆地丛书》,应取据1879—1939年版照像重印版(1967年,莱顿),在1967年版中伊本·豪卡勒书的德·胡耶校勘本已为克拉默斯(J. H. Kramers)校勘的另一更完整的抄本所取代,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近几十年来发现的好抄本毕竟多于德·胡耶时代。在这里,还可以提醒注意,伊本·法齐赫书有了1923年在马什哈德发现的“杂卷本”;伊斯塔赫里书有了希尼(al-Hini)新刊本(开罗,1961年)。在我们还没有条件直接利用世界各地珍藏的原文抄本之前,这些刊本就是我们应该备的资料。在这里,读者还可以注意,阿拉伯古典地理学著作绝大部分都有欧洲语言的译本。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二书在上个世纪就有巴比耶·德·梅纳尔(C. Barbier de Meynard)和德·胡耶的法译本,伊本·豪卡勒书有克拉默斯和威特(G. Wiet)的法译本

(贝鲁特与巴黎, 1964年); 穆卡达西书有米盖勒 (A. Miquel) 的法文节译本(大马士革, 1963年); 伊本·法齐赫书有马塞 (H. Massé) 的法译本(大马士革, 1937年); 雅古比书有威特的法译本(开罗, 1937年), 等等。

三、对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之评价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可以说是古典阿拉伯地理学的鼻祖, 他奠定了用阿拉伯语撰写地理学文献、特别是伊拉克学派的地理著作的风格和模式。如上所述, 九世纪产生了许多标有《道里邦国志》这一共同名称的作品, 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很可能是第一位使用这样名称的作者。他的著作被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们视为规范, 受到了几乎所有利用它的地理学家的称颂。然而, 正像克拉默斯所指出的,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却未必是这种体例和写作风格的首创者, 在他之前, 必定还有一本著作构成他遵循的模式。他身任邮驿部长官, 极有可能接触了古代伊朗的钵罗婆语的地理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可能还是他写作活动中的一个偶然成果。据他自己说, 这部书是应哈里发的要求而写作的, 也就是说, 这并不是他个人兴趣之所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虽然不是流传至今的描述地理学作品的第一位作者, 但他的书毕竟是迄今为止单独成帙的最早的地理学著作, 尽管是后来的简写本, 仍然使人有可能对它进行全面的评价。

艾卜·勒——嘎西姆·欧拜杜拉·本·阿卜都拉 (或作

“阿赫玛”)·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生于205/820(或211/825)年,卒年为300/912年。他的祖父的伊朗名字可以转写为Kh·r·da·dh·b·h,意思既可以解释为“太阳的无上赏赐”,也可以解释为“无上太阳所创造”。这种神名形式表明他是一个波斯血统的拜火教徒(祆教徒)。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父亲在九世纪初是哈里发马蒙派驻里海南岸陀拔里斯坦的总督,建立了征服代义赖姆(Daylam)的某些独立地区的功勋。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原来也是一位拜火教徒,后皈依伊斯兰教,曾在巴格达受良好的教育。他仰赖父亲的势力,得以就学于著名的歌手和音乐家、摩苏尔人伊斯哈克门下。出身决定了他的隆运:成年以后担任伊朗西部杰贝勒省邮政和驿传长官,后又升为巴格达及萨马拉的邮传部长官,这些职务使他有可能接近哈里发穆耳台米德(256—279/870—893年),成为最有影响的陪膳者(nadīm)之一。从伊本·奈迪姆的著名的《百科津逮》(或译《百科索引》,Kitāb al-Fihrist,十世纪末成书,149页1—5行)片断引文可知,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至少有九部之多,但几乎全是涉及美文学(Adab)或描述闲情逸致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表现出明显的亲伊朗倾向,如《波斯人谱系汇编》;另一些则纯系为上流社会人士排遣百无聊赖的生活而作,如《谈饮料》、《粗茶淡饭说》。今天,只有一份《忘情与消遣》的写本在一份私人文集中被找到了。他还写过一部《历史》,据马斯欧迪说,内容是伊斯兰以前诸民族的沿革。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着手写他的《道里邦国志》大概是在他担任杰贝勒省邮驿长官的时候。开始并没有完备的资料,他边写边搜集,这显然花费了他很长的时间。据德·胡耶推

断,初稿完成于232/846年左右,二稿的定型不早于272/885年。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最后定论,尽管多数学者支持德·胡耶的观点,但仍有少数人认为此书只有最后一稿。据德·胡耶的意见,两个原本都没有流传下来,坊间通行的是较晚的简本。

该书的优点是叙事简明,只要粗略翻阅一下全书,其结构便可了然。该书按照传统,从颂圣、讲述自然地理学知识(例如托勒密对大地形状的描述)开篇。我们应当注意,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提到的著作有些尚存异说。在记述不同国家朝拜方向(qiblah)的短章之后,就是对塞瓦德(Sawād,两河流域南部)的十二郡(astān)六十县(tasuj)的罗列和叙述。作者在这里详细列举的税收资料(本书其他部分对此也有涉及)使人们有可能藉此复原这一时期阿拔斯王朝的预算情况。这一节以罗列古代诸王名号为结束,诸多王号是根据波斯史料汇集起来的,上面开列了波斯、罗马、斯拉夫、突厥、中国统治者的称号。

本书的主要部分是由详略不等的对道路的记述构成的,这里第一次记载了巴格达北到中亚,南到印度的道路,作者给我们提供了有关大呼罗珊路的确切而翔实知识。

大呼罗珊路在阿梅越过乌浒水可至法腊勃,再经拜坎德过长城门至布哈拉,而后沿泽拉夫珊河左岸至撒麻耳干(“王家大道”)。大呼罗珊路在咀密越过乌浒水可至石汗那、久越得健、珂咄罗等地区,另一歧路经铁门、碣石至撒马耳干。大呼罗珊路从撒马耳干以北去苏对沙那的扎敏路分两叉,左叉可至石城(今塔什干)及锡尔河下游,右叉越过锡尔河上游可

至大宛(费尔干纳)。扎敏石城一路东通顿建城,一路北通白水城(今奇姆肯特),自白水城又分二叉,西通讹答刺,北进怛罗斯。从怛罗斯到中国边界热海南岸的拔塞干城的道里和沿线诸城绝大部分可以和贾耽记载的路程一一对勘。

胡尔达兹比赫在记述道里之同时提及行政区划和税收,有时还引用一些有关地名的诗句。他对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海路描写得比较生动,但是没有受“辛巴德航海”一类故事的影响,其中对海外和岛屿的物产倍加注意,详细叙述了取得樟脑的情节,描写了大象和犀牛,记述了爪哇国王之佞佛以及印度的种姓。作者对往西的道路写到西班牙,有关拜占廷的部分特别详细;往北的道路写到了阿塞拜疆和高加索;往东南方记载了从巴格达去麦加、麦地那和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道路,并列出了从巴士拉、巴格达和开罗去麦加所经过的驿站名称。这一部分最后提到了两条很重要的路线:一条是欧洲商人经苏伊士地峡和红海,或沿幼发拉底河经安提奥克前往印度和中国的路线,另一条是俄罗斯商人沿顿河和伏尔加河经里海往南的路线。不过,这一段看起来像是后来增补的。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并未以行程路线为结束,书的后尾还有一些看来是后来零星补充的内容,如大地分野、世界奇迹和著名建筑,伊本·士伦时发现的金字塔。但是,写本到此在没有形成结尾的地方突然中断,不知是何原因。

不难看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由两种性质迥然的内容构成:一方面由枯燥无味但是非常重要的官方资料汇编,一方面又是各种地理趣闻的汇集。全书没有一个完整的系统,作者安排材料的方针是有闻必录,多多益善。无疑,正

如作者引用史料时所说，他能够接触国家档案；同时，他又从行纪一类记述中引用了很多有益的资料，尤其是一些属于早期（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旅行路线的资料。内容的驳杂导致阿拉伯地理学家对他的评价不一，但他对后来的地理学文献毕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的这部地理著作备受古典时期的地理学家的重视：雅库比、伊本·法齐赫、伊本·鲁斯塔、伊本·豪卡勒、穆卡达西、扎伊哈尼、马斯欧迪吸收了他的第三个最好的写本的内容。他的知名度后来也没有减弱：伊德里西和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熟悉他的著作；波斯的地理学家们从早期的《世界境域志》的佚名作者，到晚期的哈姆达拉·可疾维尼、米尔洪德与洪德米尔也都时时加以引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本人并未建立任何学派，学界从分析研究的角度出发，认为他的《道里邦国志》是开伊拉克派之先河的著作。无论如何，他收集的材料构成了后来许多人著述的基础。

在欧洲，早在上个世纪初人们就注意到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俄国注意的重点主要是与俄国商人有关的记载。本书虽然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将伊拉克置于穆斯林世界中心位置，但作为当时哈里发王朝重要的省份呼罗珊、法尔斯、杰贝勒和中亚仍占了很大的篇幅。近年来，我国治西北史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利用本书。这实际只是一个开端，人们还可以更深入地发掘其史料的使用价值。

《税册》的作者阿卜·法尔吉·古达玛·本·贾法尔是阿拉米人，出生于巴士拉一个基督徒官吏家庭。由于接近宫廷，他本人听从当时的哈里发穆克陶菲（289—295/902—907年

在位)的要求皈依伊斯兰教,这为他铺平了担任高级职务的道路。古达玛的生年不明,可能的生年早在260/873-4年,当伊本·弗拉特任宰相时,他于297/909-910年主持了监察部门。他的卒年有三种说法,即穆格台迪尔在位(892—902)期间、或328/939-940、或337/948年,通常以为他死于300年之后不久或310年的说法是不确实的。

德·胡耶把古达玛的《税册》的摘要作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附录加以刊布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因为两人的经历和两书的性质确实多有相似之处。古达玛的创作活动和风格都令人想起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据学者们研究,《税册》写成于316/928年左右,共分八篇,但只有四篇即第二卷流传下来了。现行刊本只刊出了该书有关税收的内容,其结构是:驿道和省区的描写、各地的赋税制度、各地的赋额、纳税的精确数字。有时,本书也记载山川河流等自然地理情况、七种地带等等,甚而引述某些历史学家有关阿拉伯人征服活动的片断资料,但是,这一切也都着眼于提供“道里知识”,目的在于为国家机构的领导者提供治国经邦或迅速调遣军队等的参考资料。总的看来,人们最好是把《税册》的这些内容看作是对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的重要补充。古达玛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两人大概都利用了同样一些有关九世纪初、个别地方有关八世纪末的官方档案,在这些地方,两书可以彼此对勘;由于古达玛成书在后,因而有许多细节补充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之不足。但是,现在的古达玛写本也存在某些问题,其中有些词句本来是后人写在叶边上对内容难点的注释,却被抄手录入了正文(参看米诺尔斯基译注本《世界境域志》,291

页注3)。

四、阿拉伯地理文献的史料价值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界已有定论。原因在于，阿拉伯人的视野包括除北极之外的整个欧洲、除西伯利亚之外的亚洲，南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与希腊人相比，阿拉伯人的世界大大超过了希腊人所知道的世界范围。即以非洲为例，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在阿拉伯地理著作中首次得到了详细的记述，以至于直到十九世纪著名的欧洲旅行者探察非洲之前，世人对该地区的了解仍未超过阿拉伯人的记载。阿拉伯人也掌握了距离他们遥远的许多地区，如北方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东方马来群岛的资料，这些资料已为现代科学证明是十分重要的。

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对于我国学者说来一个重要的用途是，其中许多记载可以用来比勘、验证汉文典籍的记载。唐德宗贞元(785—805年)宰相贾耽记载的通西域道路，至少从碎叶到咀逻斯的路段可以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古达玛、嘎尔迪吉等人的相应记载相比勘、对证。例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书中提到了科帕勒(Kopal)这一城镇的名字，古达玛进一步指出这个科帕勒分科帕勒与萨兀尔科帕勒两城，十世纪下半叶成书的波斯文《世界境域志》记述说此地有三镇，十一世纪上半叶成书的嘎尔迪吉的《记述的装饰》十分明确地标出三镇的名称，其中一镇就是碎叶。由此可见，阿拉伯地理文献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中外文对比的史料，而且告诉我们某些西域城

镇的变化或沿革。又如,唐初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一、卷十二中涉及大量粟特地区、吐火罗地区的地名,学界历来主要是依靠阿拉伯、波斯古典地理学文献进行考证。我们还可以指出,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记载的从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河口经法尔斯海(Fars)、拉尔海(Larwi)、哈尔肯德(Harkand)海、撒拉赫特海(Salahit 或 Salaht)、昆都兰海(Kundurang 或 Kardang)、桑夫海(Sanf)、桑吉海(Sangi)等七海到达中国广州的海路及其沿途许多地名,也可以与贾耽记载的广州入南海道对勘,其中撒拉赫特海在唐代称“质海”、“硖”,即今马六甲海峡;昆都兰海当时称军突弄海,相当今天的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之间的三角海域,即今爪哇海北部和暹罗湾南部;桑夫海当时称占不牢海;桑吉海则是涨海的译音,即我国的南海。

然而,人们在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献进行历史考证的时候,必须十分留意阿拉伯地理学家在处理资料年代上的缺陷。阿拉伯地理学家的长处是重视从实际生活中集累资料,可是,他们却经常不注意指明不同时期的文献史料的年份。此外,阿拉伯人进行著述活动时,对文献的使用方式又近乎今天人们所说的剽窃,他们联缀,乃至照抄前人的记载,并不声明前人记载的年代。在古典地理学的盛世第十世纪,扎伊哈尼的地理著作吞纳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伊本·法齐赫的原作,而伊本·法齐赫的著作又很难同贾希兹(?—255/869)的作品区别开来,如此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倘若作者指出自己的史料来源,这种缺点倒成了优点,那些没有直接流传下来的作品常常因此得以或多或少保留其片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伊本·法德兰的行纪,直到马什哈德杂卷写本发现之前,所有研究

这份行纪的人都依据比伊本·法德兰晚三个世纪才撰成的雅库特《地理词书》中引用的片段。很可惜，这样的符合科学研究方式的引用史料法在阿拉伯地理文献中是比较罕见的。因此，我们必须随时留意，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许多记载并不一定反映与作者同时，我们必须随时随地仔细区分抄袭来的内容的时代和作者自己增补的内容的年代。有的学者举过例子，雅库特书著录了“塞斯坦”条，其中从前人著作抄录了有关哈里及派活动的材料，就好像这个在七世纪末盛行的政治宗教派别直到雅库特生活的第十三世纪依然十分活跃于塞斯坦地区一样。我们今天利用阿拉伯地理资料，当然应当力求避免蹈袭同样的时代谬误。

总的说来，阿拉伯古典地理文献侧重于人文地理资料的汇集，这类著作除了对边远地区的情况限于当时的知识水平或出于猎奇心理而采摭了不少奇异传闻 (mirabilia) 因而流于荒诞之外，大部分事实记载是翔实可靠的。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家都是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放在任何时代都属于善于观察事物和搜集资料的人物之列。他们行文也有特点，叙事简炼，文字浅显。近代学者研究西亚、中亚史地，除了依据白拉祖里 (al-Balādhuri, 卒于 892 年)、泰伯里 (al-Tabari, 卒于 923 年)、伊本·阿西尔 (Ibn Athir, 卒于 1233 年) 等大家的史学著作之外，无不强调利用穆斯林地理著作，其原因大概正在于此。

四十多年前，我国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西域史的著名学者冯承钧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大食人米撒儿行纪中之西域部落》，作者在文章的开头指出：“大食、波斯、突厥的著作，国

人研究的很少,其实这也是一种最重要的史料,大食、波斯、突厥文的撰述涉及东方的,可考者不下五六十种”。近年,美国哈佛大学伊朗史教授理查德·弗莱(R. Fryc)也发表过类似见解,他刊布过纳尔沙希的《布哈拉城史》译注,指出穆斯林地理资料“未得应有的利用”;他在七十年代末发表的一篇论文题为《论供研究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史的穆斯林史料》,其中也说:“穆斯林地理学家们的著作是有关伊斯兰时代以前中亚的资料宝藏,迄今没有做到应有的利用”。诚然,阿拉伯、波斯、突厥的地理文献既包括地理资料本身,又包括许多历史史料,正如许多穆斯林史学著作中也包括大量地理资料一样。从上个世纪以来,德·胡耶(M. J. de Goeje)、托玛舍克(W. Tomaschek)、马迦特(J. Marquart)、巴托尔德(V. Barthold)、米诺尔斯基(V. Minorsky)、波义耳(A. Boyle)、普里察克(O. Pritsak)、博斯沃斯(C. E. Bosworth)等人利用阿拉伯地理文献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今天,这些文献仍然大有利用之余地。现在,中华书局决定刊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古达玛的汉译本,委实是我国开始利用穆斯林文献的重要成果,希望译者宋岷同志再接再厉,向我国学术界贡献更多的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译本。

张广达

一九八六年七月

译 者 序

《道里邦国志》(以下简称《道里志》)的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本名艾卜·嘎西姆,阿拔斯朝(750—1258年,我国史称黑衣大食)人,生于回历205/公元820年,或211/825年,卒于300/912年。据伊本·奈迪姆(Ibn Nadīm,卒于回历385/公元995年)的《百科索引》(Fihrist al-'Ulūm)所言,其祖父胡尔达兹比赫原是一位拜火教徒,在拜尔麦克人专权时期(765—803年)皈依了伊斯兰教。又据巴尔比耶·德·梅纳尔(Barbier de Meynard)考证,“胡尔达兹比赫”在中世纪波斯语中意思是“太阳的赐与”或“太阳的创造”,从而表明作者是波斯人后裔。《百科索引》提及,作者曾担任过阿拔斯王朝杰贝勒省的邮政、情报长官,是哈里发(即大食王)穆耳台米德(Mu'tamid,870—893年在位)的挚友,得其尊宠。作者博学多才,著述宏富,《百科索引》列出了他撰写的九部书的书名。被誉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马斯欧迪(Mas'ūdī,卒于956年)在其《黄金牧地与宝石矿藏》(Murūj al-Dhahab wa-Ma'ādin al-Jawhar)一书中,称颂《道里志》为“一部珍贵的书,它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始终都可以从中得到教益和知识。”(卷1,13页)

九世纪中、后期,阿拔斯王朝在政治上已由鼎盛趋向衰落,哈里发因耽于享乐,倦于亲政而实权旁落。由于社会经济

有一定的发展,帝国尚处在相对稳定中,国内的诸种税收以及国际贸易,使巨额财富高度地集中在中央政府与哈里发手中,帝国的统治者们从中得到大量的物质享受。哈里发出于统治和娱乐的需要,十分关心帝国的税收及与国际贸易有关的知识,愿意详细地了解世界诸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地的山川道里、异景奇观、经济物产等情况。《道里志》就是为满足这些需要而产生的。这与隋炀帝时的裴矩撰写《西域图记》以求开西域商道的作法和目的是相似的。

《道里志》不仅记有各地之间的路程,各地的商货及其质量与价格、商路上的食宿条件、海港与海上航程等情形,而且为读者描绘出一个存在于九世纪的国际贸易路线图,其范围之大,几乎将整个文明世界都包括了进去,东面记有倭国(日本 Al-Wāqwāq)、新罗(朝鲜 Smlā)、麻逸(今菲律宾的民都洛岛 Māyt)、香料群岛(今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及中国;西面记有法兰克、安达陆西亚(西班牙)、比勒陀尼亚(不列颠群岛)。它详细地介绍了犹太商人、罗斯(古俄罗斯)商人及伊斯兰帝国的穆斯林商人在国际贸易中的积极作用。《道里志》尤其是对中国的诸港口、河流、物产以及海上航程等情况有着较为具体的记述。这些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唐代中外贸易史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

《道里志》对研究横贯中亚的丝绸之路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唐贾耽在其《边州通四夷道》中记述了丝绸之路(北道)的东半段路程,但是,对石国(今塔什干一带)以西的西半段路程则无任何记载。《道里志》恰好是详细地写出了丝绸之路西半段的情况,若是将这两部书合在一处研究,则可相互补

充、参证，有珠联璧合之妙。

《道里志》翔实地记载了阿拔斯王朝的土地税的征收，行政区的划分，民族的迁徙与分布，农田水利的兴废等情形；也记载了很多已覆灭了两个多世纪的波斯萨珊王朝（226—650年）及罗马帝国的情形。这为我们了解唐代西域的波斯、大食、拂菻诸国情形提供了重要资料。

据德·胡耶(De Goeje)教授 1889 年介绍，《道里志》首次写成于回历 232/公元 846 年左右，后又作了增补，因此，在回历 272/公元 885 年出现了第二种写本。如今，有三个不同的阿拉伯文写本传世，一是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写本(抄于回历 630 年)，巴尔比耶·德·梅纳尔将此写本于 1865 年刊布在巴黎的《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上，并附有法译文，此写本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于学术界曾有很大的影响。另一个写本是卡尔罗(Carlo)博士于 1885 年在东方发现、购得的，在 1886 年维也纳举行的东方学者代表大会上，他将此写本赠予法国皇家文库，德·胡耶于 1889 年将此写本校订，刊布在他编辑的《阿拉伯舆地丛书》(BGA)第六卷(出版于荷兰莱顿)上，并附有法译文。第三种写本现藏于波德利(Bodleian)图书馆，因质量差，一直没有刊布。德·胡耶将莱顿本定为 A 种写本，将巴黎本定为 B 种写本，并指出 A 种本优于 B 种本，二十世纪以来，这一观点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A 种本不仅内容丰富，而且抄写准确，因此，本书是译自 A 种写本(莱顿版)。

另附《税册及其编写》(以下简称为《税册》)，其内容与《道里志》大体相同，两位作者似乎使用的是同一种素材。《税册》

的作者古达玛(Qudāmah,其卒年有三种说法,即穆格台迪尔在位的892—902年间,或328/939—940,或337/948年,通常以为他死于932年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原是基督教徒,在哈里发穆克陶菲·比拉(Muktawfī bi Allāh,902—907年在位)时皈依了伊斯兰教,是阿拉伯文学家,著述甚丰,以“巴格达的作家”驰名,曾担任过税务官。

由于《税册》(节本)与《道里志》被德·胡耶收入《阿拉伯舆地丛书》的同一卷中,因此,现将两书一并译出。本书同(美国)西提著、马坚译的《阿拉伯通史》采用的是同一套拉丁字对音法。书中地名以音译为主,如有反映地貌特点的地名,则加注说明,同时,也注意使用一些尽人皆知的译法。

翻译时,主要依靠的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参考书、工具书。这样做,使用语言工具的面比较窄,一些问题尚乏透辟的解决。比如,中亚的地名、民族名,若具有突厥语知识,就会翻译、注释得更好些。这样做的优点是,所利用的当今出版的诸种阿拉伯文、波斯文工具书,多是在吸收了世界各国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所利用的古文献也多是阿拉伯文原始资料,这对某些词义的查核与判断就比一个世纪前准确、便利得多。另外,《道里志》成书于一千余年前,其中的一些词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变化,有的词在今天的工具书中已找不到了,尤其是《道里志》的作者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是波斯人后裔,他恰又是在波斯人左右黑衣大食朝政时期写作的,因而,该书大量地追述了波斯帝国的业绩和古老的波斯传说,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灿烂的波斯历史文化的热爱和民族自豪感。同

时,在语法和词汇的运用上也多受古波斯语文的影响,也就是说,他虽然是在用阿拉伯文写作,但是,他的阿拉伯文并不很地道。这也给翻译工作增加了难度。由于译者水平所限,难免有译错之处,敬请读者和专家们斧正。

这两部书的全部注释均为本人所作。为保持其历史感,便于读者参阅,我尽量援用唐代的中、阿文史料作注。对与中外关系史、中亚史研究有较多关系的地名、民族名,加注稍详。

在此书的翻译过程中,我得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的领导和同事们的有力支持;得到了陆峻岭、张广达、谢方诸位先生的具体指导,他们的学术成就对本书的译注工作起到过重要作用。我还得到了我的法文老师耿昇先生的诸多帮助;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邳溥浩先生,他在繁忙之中抽时间为此书的整部译稿做了精详的校订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成书之际,我十分感激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广达先生为此书作序。

宋 岷

1986年3月于北京

作 者 序

以大慈大悲的真主之名！

啊，诸位高尚的领袖、公正的教长的孩子^①、宗教的灯塔、人类的精英！愿至高无上的真主赐给您永恒的幸福，保佑您在正义的道路上获得成功，使您成为他乐于帮助的人。我得知，您一直盼望着真主能够使您极其幸福地欢度一生，在“两世”^②生活中都吉祥如意，并且不断地扩大您的帝国的版图。这版图仍须像前人那样，明示着大地上的诸道路、国家及其特征；明示着各地之间的距离、人烟的疏密；明示着各地之间的穿越沙漠和偏远地带的路径，标明其路程和气候。我看到过托勒密(Ptolemies)的用外国文字书写的对地图的特征进行了描述的书，他为其特征划定了界限，提供了证据。我将托勒密的外国文翻译成最正确的语言^③，以便人们能看懂这些图。为了使您的愿望，即随心所欲地看到遥远地区的风光，听到附近发生的新闻得以实现(这正是我的心愿)，我特地为您绘制了地图，也因此，我写出了这部书。赞美真主！它是强大至尊

① 诸位领袖、教长，专指当朝的大食王的历代先王。黑衣大食朝诸王既是该国的政治首领，也是宗教领袖。

② “两世”，伊斯兰教术语，指今世和来世。伊斯兰教认为每个人都要过两世生活。见于《古兰经》。

③ 正确的语言，专指阿拉伯语文。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用阿拉伯语将《古兰经》陆续降示给教主穆罕默德的。

的、普施厚恩的，它创造其所愿意出现的。它为自己的崇拜者指明了真理之路。它拒纳多神教徒。它赐福祉于先知穆罕默德及其亲属^①，并向他们致以最大的敬意。赞美真主之际，我为这部书写出了如上的序言。

^① “穆罕默德的亲属”是黑衣大食王族的专称。黑衣大食王的祖先阿拔斯，是教主穆罕默德的伯父，同属一个部族——哈申 (Al-Hāshimiyah) 族，因此，大食王被视为穆罕默德的亲属。

目 录

前言	(1)
译者序	(23)
作者序	(29)
道里邦国志	
各地人民礼拜的方向	(3)
塞瓦杜	(5)
迪吉拉河与塔麦拉河流域的东侧地面	(5)
迪吉拉河与富拉特河流域	(6)
塞瓦杜(省)的估定收税额	(9)
塞瓦杜省的收税总额	(14)
古代地球上的诸国君主及其王国	(16)
各地诸王的称号	(17)
被阿尔代希尔封有“沙赫”徽号的诸王	(18)
东方的情形	(20)
从和平城到呼罗珊的边陲的道路	(21)
伊斯白罕的诸镇	(23)
从哈马丹到垓兹温的路程	(24)
通向石国、突厥的道路	(27)
从扎敏到拔汗那的道路	(32)